



83



前　　言

抢救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我区位于柳州市中部，是柳州的老城区。自西汉设县以来的两千余年间，一直是县、郡、州、府署治所。有悠久历史。柳州的交通较为发达。是湘桂、黔桂、枝柳铁路交会处。水路可通梧州、广州、香港，公路四通八达，历来是柳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个历史时期和重要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俗人情等各方面的变革，也在这里发生和发展。有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文史资料值得收集和整理。岁月流失，耄耋逐减，抢救文史资料工作成为当务之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抓紧抓好。

政协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指出：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在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指导下，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的精神，开拓前进。为此，我们拟通过《城中文史》收集和交流我区的文史资料，期望能为城中区地方志和柳州的文史资料起到拾遗补阙作用。希望我区各界人士大家共同关心支持和帮助，积极撰稿或提供史料，共同努力把它办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限于人力、财力和水平，粗俗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

***** 城中文史 *****
* 第二期 *
* ***** 目 录 *****

前 言	编 者
城中区辖区内文化街形成和变化	盛德萱 (1)
我对民团的经历的回忆	梁镇海 (2)
柳江县市区建设委员会及桥工处 成立和标卖全市城基地经过	梁镇海 (3)
西柴街忆旧	朱光华 (4)

城中区辖区内文化街的形成和变化

盛德萱

(一)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那时梧州人口较少，文化教育事业尚未兴起，经营图书、文具、印刷纸张的商店很少，在映山街口和人字街（今中山西路与中山中路交界处）有一家经文堂和一家李联昌，经营的书籍是木版书和石印版，线装本册，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和四书五经等。兼营一些笔墨土纸。还用木版手工印刷一些八行信纸、十行纸、信封、学生用的描红本、字帖等等。

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有湖北人张锦伦从武汉、长沙等地贩运少量图书来柳，从肩挑串乡、街边摆卖，资本越赚越多，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在映山街租得铺屋开设萃文书店，经销梧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独家经营，发展很快，获利甚丰，资本由几百元，仅两三年就赚了上万元，当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柳州大火，该店付之一炬；民国十二年（1923年）有湖北人刘元福在庆云路（中山中路芙蓉巷口）开设福记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有安徽人祝兆琪初来柳是从江西贩运瓷器出卖，见书店生意好做，就在离刘福记隔几家开设兴盛书局，不久，又有安徽人程筱安、汪伟成合伙在庆云路西段开设利群商店，经营湖笔、徽墨、文房四宝，兼营图画，又有本地人蔡汝馨^馨在庆云路东段开设元益商店，经营文具、纸张图画，生盛昌印务局，原专做印刷生意，见书店生意好做，也兼营图书文具，那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渊书局、世界书局等几家在梧州设有分局，为了推销本局出版的教科书及各种图书，每年春秋两季学校开学前派员来柳推销，向各店要进货计划，并

给种种优惠，以赊销往来，半年结算，按书原定价八折九扣。凡中小学采用教科书每二十本赠送老师教学法一本，更有甚者，各大书局推销员到柳州，到县府教育科打招呼，请客送礼，互相竞争，本地几家书店为了争取销售，也向本市及附近乡镇学校校长、教师赠送礼品，在这种激烈竞争中，经过协商，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成立书业组，由庆云路生盛昌、刘福记书局，兴盛书局，元益商店、利群商店等几家推选负责人，凡经销梧州几家大书店的中小学教科书，统一由书业组批销，每半年结算一次，所得利润按股分红。从此解决了利益冲突的矛盾。

（二）自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由梧州迁来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分馆，上海中华书局分局，乐群书店，上海杂志社，由广州迁来的开明书局，北新书局，生活书店，新亚书店，新生书店，由武汉迁来的有国新书店，荣记书店，强记书店，南宁分来的强华书局等十多家，这些书店都集中开设在庆云路（中山中路），东大路（中山东路），培新路（立新路）一带，在这一时期，由于沦陷区的国民政府的军事机关、学校及难民纷纷涌到柳州，人口骤增，柳州由原来的七八万人口增加近二十万人，市场顿时兴旺起来，书店生意也兴隆起来，由此带动了文化用品和印刷纸张业发展，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庆云路仅有生盛昌印务局、同仁印刷局、三民印务局等几家，只有几架手摇石印机和机台四开铅印机、机台元盘机，后来由长沙、桂林等地迁来的印刷厂有大成印刷厂、光华印刷厂、新新印刷厂、华成印刷厂、还有陆续新开设的大小印刷厂、如大华印刷厂、联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锦新印刷局、三连印刷店等，以上这些厂店大部分设庆云路，东大路一带，在抗日战争以前经

营文化用品和纸张都是由书店和印刷店兼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营文化用品和纸张的商店越开越多，开设在庆云路的有商务文具社、三星文具社、三达文具店，进生文具店、维新文具店、三益文具店等六家，专营纸张的店开始只有志昌纸店，开设在兴仁中路（曙光中路）资本较大、经营机制纸、道林纸新闻纸有光纸、卷烟纸等，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年）以后陆续新开业纸店有盛昌纸店、国强纸店、宝泰纸店、华太纸店、湘大纸店、昌兴纸店、文兴纸店、宏兴纸店、德兴文具纸店，这些纸店都集中开设在兴仁路。从广州沦陷以后机制纸来源渐少，这些纸店都改营土纸（湖南湘纸、江西玉扣纸、福建官堆纸、南山贝纸、北山贝纸、花丕纸、红纸等等。

在抗战初期，图书和文化用品的来源是靠由广州、武汉疏散来柳的存货供应市场，后在图书方面、有部分出版的书店内迁到桂林和重庆，那时由于机制纸缺乏、出版的书刊改为土纸印刷、文具货源除能在内地生产外，大部分要靠从上海运进，要经香港再转湛江、用人肩挑运至玉林（因为湛江至玉林公路被破坏）因此运价高过货价。

（三）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庆云路、东大路（中山中路、中山东路）一带经营图书、文化用品、纸张印刷的商店逐渐增多，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沦陷区国民政府机关学校内迁，人口大量迁来定居，庆云路、东大路、正南路、兴仁路、这几条街地处河北闹市中心，附近有柳江县府、柳州专员公署、警察局、镇公所、银行、税局等单位，学校有柳州高中、柳庆师范、龙城中学、中正中学、豫章中学、景行路小学、公园路小学、湾塘路小学、西大路小学、东台路小学、青云路小学等。

(2) 新潮流、新文化的冲击，在抗日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界、教育界，对新文化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每到夜间庆云路一带的书店和文具店挤满了读者和顾客，书店都要到夜晚九、十点钟才关门，当时销售量最大的是中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学习工具书，其次是历史小说、古典文艺小说、现代文艺小说、文学笔记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世界名著翻译本等等。当时所谓畅销书（抗战小册子）中有淞沪血战记、抗日英雄马占山、大战平型关、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台儿庄大捷，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毛泽东印象记、朱德印象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各书店都感到供不应求。那时读者最欢迎的书刊是现代进步作家鲁迅著作、文学作品、阿Q正传、彷徨、呐喊（鲁迅三十年集）等，巴金著的家、春、秋、群，曹禺著的雷雨、日出，老舍著的、郭沫若著的历史春秋，邹韬奋著的萍踪寄语和他主编的生活日报和生活周刊（在香港出版），张恨水著的啼笑姻缘、满江红、落霞孤雾、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还有很多著名的进步作家，如沈钧儒、沙千里、章乃器、金仲华、郁达夫、丰子恺、周作人、冰心、史良、徐志摩等所著的文学、文艺作品、书刊风行全国，也是庆云路一带书店、文具用品店的鼎盛时期。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四年侵略魔爪伸向广西，桂林、柳州相继沦陷，外地迁来柳州的书店、文具店大部份疏散到贵阳、重庆。其他都疏散到附近各县山区，柳州沦陷不到一年，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告战败无条件投降，但日军在柳州临撤退前放火烧毁了全市主要街道房屋，所剩无几，柳江路、小南路、兴仁路、正南路、潭中路、东大路、东台路、公园路、映山街、柳新街的铺屋及民房、机关学校均被焚毁，满目疮痍，而疏散到各地书店、文具店、纸张印刷店陆续迁回原址，搭盖一

些临时房屋开门营业，不久这条街的市面逐渐恢复起来，但有部份原来由广州、武汉迁来的书店没有复业，其他书店、文具店、纸张印刷店均重整旗鼓，从上海、广州、武汉购进新书刊、文化用品、纸张和印刷用品，庆云路一带“文化一条街”又兴旺起来。

(3)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攫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挑起内战，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派便衣特务到庆云路检查各书店出售的书刊，那时有几家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如青年书店、新生书店，国华书局，被查封一批书刊，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书都是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反动统治，当一九四九年国华书局收到邮局由香港寄来的“文艺周刊”，每月寄来一次，书刊内容是宣传解放战争及共产党统战政策，但未敢公开出售，每次到货都是卖给熟悉学校老师和青年学生，在柳州临解放前不久，有两间书店被查封，为了清查地下党，搞户口大清查，十户联保，真是鸡犬不宁，未过几月，柳州临近解放，有的工商业户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逃到香港和昆明，河内，但书店和文化用品店、印刷店没有一户逃离柳州或停业，坚持等待解放，柳州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解放军进城宣布柳州解放，贴出安民告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天下午，庆云路、东大路、正南路、十字街一带，龙中、柳高学生敲锣打鼓跳起秧歌，庆祝解放，庆云路一带书店当天下午即开门营业。

(4)柳州解放后，图书文具纸张印刷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繁荣经济，保障供给、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感召下，庆云路、曙光路一带的文化用品，纸张印刷店不但得到发展，而且增开了一新纸庄、大东纸店、文兴纸店、生花馆^笔店，华华墨局、大信文具店、豫中文具社、同丰祥乐器店、联合水笔行、庆云书

店、美华印刷局、华成印刷厂、和兴印刷局等十多家。至一九五二年经过“三反、五反”一系列政治运动，党和政府号召工商界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掀起三大改造，私营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工业方面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方面通过私私联营，代购代销，凡专业经营书店有文渊书局等几家联营成立联合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随上海总公司成立中国图书公司，后来合并到新华书店、文化用品店二十多家共并成四家联营店，设在庆云路的是新联文化品商店、通联文化用品商店两家，另在河南驾鹤西路设立两家，一家文联文化用品商店、一家国华文化用品商店，直到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原来私私联营基础上实行公私合营，并成立文化用品公司，政府派赵国瑞为公方代表兼经理，并委盛德萱为副经理，不久，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将文化用品公司及四个门市部并入了百货公司。

我对民团经历的回忆

梁镇海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一零七零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明代相沿。至万历年间。就地选取丁壮加以军事训练，团组成单位为团练、清仍旧制。在县设保甲局或团保局。职管基层户籍和兵源。城镇、乡村设团局，由县团保局选派团董，俗称团总。

柳州附城两岸，团局组织更为紧密，特别在民十政变（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几年间，对各自然街道，居民习惯供奉的“社王”所在范围一个辖区，由

县团保局选派一个团董（或团总）负责。当时兵荒匪乱，情况上，也不需要征兵。团总主要职责征伐（为军队当运输队）和区内居民之间、内外或家庭之间的不和睦；债务纠纷；打架斗殴扒窃等案发生。对解决不下的问题再行上报总团以至县署裁决（有时政府瘫痪，仍由总团处置。）

民国十年六月底，旧桂系头子陆荣廷在广西崩溃，市区内的老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自动起来加强国防组织。在城中区包括北门外、鹿鸣村及南岸、~~新~~埠村等，成立马平县联防总团局，各村街民众推高景纯为团董。高景纯是前任广东、广西督军陈炯明（东门街人）任内的卫戍司令，民国九年，从广东失败回来不久，带回来两百条步枪和一些下级旧部。于是，民团总局就设在他的家里。后迁到陈督军公馆内。其它各村街团，除了城中区各街均属商贾铺户和居民，没有设备防卫枪械，而有总团保护之外；其它为河南岸方面的振柳团、闸外团、谷埠团、云岭团、水南团及~~新~~埠团，都自筹置有枪械和雇有团丁来保卫自己的本村街。

在日常处理问题方面，总团权力大可单独处理很大的案件（指政府瘫痪时期）我曾亲见该团局枪毙两个罪犯（由东城门出以东台路鸿鹄堆作刑场）：一名犯人是赵某，因他的妻子与团局的谢队长通奸，赵一天乘谢不备，用五寸小刀将谢某戳死治罪；一名是住居在粤东会馆角的小偷，因偷别人的猪而被枪毙（当然还累犯有罪的）。至于民事案件：为黄秉衡与原配刘氏离婚，也是在民团局裁定的等等。

其它街道团的情况如：振柳、水南、~~新~~埠均先后被土匪抢过，各团分别自卫使各匪均未得逞。尤其~~新~~埠团，当土匪来抢时，团总黄有玉的大太持枪冲出，还缴获土匪一枝步枪，上交总团。总团除表扬外，还以此案例典型晓谕各团以资共

同鼓励，足见当时民团自卫的力量。

当年韩军（韩采龙、韩采辉、韩采凤，其中韩采凤比较好的），沈鸿英，以及滇、黔军过境等军纪腐败殃民，则民团不能为力了。尤其是韩采龙采辉兄弟的部队，公开在夜间在市区内抢劫老百姓，当时民间讥之为“箩筐队”进城，他们抢劫劫掠行为使老百姓遭受重大损失。民国十五年后，由于新桂系的统一掌握了广西政权，地方较为安定，民团局的制度依然存在，民团总局设在三官厅内（即现之东大路红十字第三门诊部内）行政上均属于马平县署的管辖。由县署发号施令，其权力大受限制，记得那时曾当过副局董的有柯子玉老者。柯曾做过刘震寰部的警卫团营长。局里的人员仍多是高景纯旧部，那时总局的经费，由县款支给，其各街道团除一部份由局由商铺捐助外，其余多系义务职。

民国十九年成立民团司令部，县长兼民团司令迨至民国二十二年，新桂系先后训练了各期民团干训生，于是年将各街团局裁撤，民团总局是年撤销。成立雍和区公所，各街编设街甲，附近市郊及河西编为村甲、成立乡镇公所。至此群众的民团组织就告结束了。

柳江县市区建设委员会及桥工处

成立和标卖全市城基地的经过

梁镇海

民国三十年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邱昌渭，鉴于柳江县市区为我国交通枢纽，又是西南重镇，并时值对日抗战的大后方，别省退来避难的人，络绎不绝。而且柳州市容破败不堪。对于市容的整顿，责任是属于柳州警察局，局是直属省府的，而省又无建设经费下拨，无能为力，邱厅长昌渭来到柳州河南乐群社，召开会议。

指定柳州专员尹承纲，柳江县长萧劲华，柳州警察局长周必昌，柳江参议会议长覃采如出席，宣布成立柳江市区建设委员会，并指定专员兼主任委员。县长、局长为付主任委员（均义务兼职）议长为驻会秘书（有职），第二次正付主任会议内增聘付议长洪惠周及熟悉工程的康泰庄两人为委员，并委洪为会计主任。我在议会工作为了监督地方的财政收支亦调去兼出纳职务。

会内的组织，除委员会外，下设总务、财务、工务、卫生等科及会计室、工程、清洁两队和一个警卫班。工务卫生两科及工程、卫生两队是由警察局拨来的，工程队100名，清洁工60名。会址设在柳侯公园船厅内后迁至思柳轩（两处在沦陷时被焚毁）。

会内经费开办时由警察局拨来壹万元，以后经常费由花捐、筵席捐、娱乐捐、电灯、自来水、养路费等附加增收及房屋建筑许多征收费等而来。

在该会建设方面，现能回忆的有翻修了北大路（即由现解放北路至中央银行）公园内进门处及思柳轩前的路面，修建了大南门马头及下水道，建筑了“抗建堂”大商场（旧址即现东大路新华书店处）及修补了市内各条路面。在河南方面，开设了屏山大道和张滩路等。

在民国三十二年会内拟建南北两岸交通大桥，经费的筹建第一步出卖鱼峰路被火焚过的铺屋十八间，卖给邮局的八间得屋款六十万法币，卖给广面地产公司十间得屋款八十万，但远远不够建桥费用。后来就由委员会决议标卖全市的城区地。该全城基地即现在的城中区全辖范围。当时恰遇柳江县参议会改选原参议长，闻德轩兼建设委员会秘书被选掉了，因此索性成立桥工处，推闻为处长，聘请梁构为副处长（梁是旧桂系谭浩明的副官长，新桂系又做过思恩、罗城等县县长）。

长)在标卖城基地外,在桥管处又标卖两处。一处在大南门即现在新东粮店斜坡大南菜市基地。一处在中山东路11号该处已建地楼房标卖的。

在施工方面:只见请了广西省政府的钻探队在五显码头(即大桥北岸边河边上)钻探了桥基。

民国三十二年我已离开参议会和建委会工作,当时财政收支情况不甚了解三十三年市区沦陷,桥工处迁避罗城,胜利后亦不见恢复了。

西柴街忆旧

朱光华

西柴街,顾名思义,是位于城区之西面又与木柴结缘的一条街。不错,正是这样,这条街明清时代属于紧靠城墙的城外街,只有半边街。西门城楼即在与柳荫路连接的街口处。民国十七年秋大火灾时被烧毁后拆除。

西柴路的得名源于柳州沦陷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由原来的西兴街和柴行街合并后西取名的。西兴街是挨近城墙的正街,南接长寿街,北连柳荫路,房屋比较整齐,多为砖墙瓦面,柴行街则在西门大码头之下的河边一带,房屋都是矮小的板皮房,零零散散,易拆易建,便于洪水来时拆迁,原来的两条街都是做柴火生意的,从柳江上游长安、三江的富禄、老堡口,由侗人用木排运下来的柴火,都在西门大码头集散,为了搬抬木柴的方便,所以西门大码头建筑得比较宽大,坡度不陡,青石为底,石级平坦,抗战期间西门大码头经营梨水柴庄,较大的字号有曹泗记、吴胜记、刘吉记、覃发昌、麦从江、朱天华等字号,大都供应小南路的苏杭铺、沙街(今柳江路)的平码行、正南街(今解放南路)及庆云路(中山

中)的食品馆及其它商店。市内的各大商号买柴火一般均由伙计上门订购，柴商按时请挑夫按每百斤一担，凭筹码(盖印竹签)送货上门。每月农历的初二和十六结帐两次。大码头下面的柴行街，多是小本经营的柴贩，他们或自挑或请人挑到大街菜市去卖，一般供应街道小户人家。柴行街的柴贩最头疼的是搬大水，春夏之交，天雨连绵，河水暴涨，既要拆屋，又要搬货，河坎又滑，更无电灯，搬上搬下，真是精疲力尽，苦不堪言。

曾记得在日寇入侵柳州前，西柴街正街的青石板路，因年久陷沉，凹凸不平积水难消，行走困难，加上城墙泥土下塌，使街道越来越窄，街民们便自发的捐钱，雇请泥水工翻修过一次，从河边挖来沙石，将石板撬起垫高，铺设平整，挖齐了城基，这确是自立更生之举，在当时要政府拿钱出来为民修路，是根本办不到的。

西柴街的正街东面，原为城墙，直到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还留有一段杂草丛生的城墙，以后才陆续被居民挖平建屋。1964年，一冯姓者在城墙顶端挖出大铁炮一樽，为清代铸造，大概是当时守城埋留下来的，后送交市博物馆收藏。

今天，西柴街的木板房已全部绝迹，取而代之的多是两三层的平顶楼房，只是古老的青石板路，仅剩下大码头最下面的一段，这是近年来人民政府为了方便群众行走和打扫街道卫生，用三合土铺平了路西，古旧的石板街已完成其历史的任务了。